

空间叙事视角下《简·爱》和《小妇人》中的“阁楼”意象对比研究

张潇月, 王亚萍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金华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0日

摘要

本研究以龙迪勇的空间叙事理论为框架, 将19世纪女性经验书写小说《简·爱》与《小妇人》中的“阁楼”空间作为核心分析对象。通过比较分析“阁楼”意象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本文系统剖析了其承载的相异隐喻及其在各自文本上下文中的独特作用。本研究怀有双重学术旨趣: 既为经典的空间叙事理论注入新的文本案例, 也试图通过精微的个案分析, 成为空间叙事理论中一次具体语境下的应用与检验。

关键词

空间叙事, 阁楼, 《简·爱》, 《小妇人》, 对比

A Comparison Study of the “Attic” Imagery in *Jane Eyre* and *Little Wo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Narrative

Xiaoyue Zhang, Yaping W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Received: March 17, 2026; accepted: June 2, 2026; published: June 10,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Long Diyong's theory of spatial narrative and takes the “attic” spaces in the 19th-century feminist novels *Jane Eyre* and *Little Women* as its core analytical objects.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attic” imagery,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distinct metaphors they carry and their unique role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textual contexts. The research pursues a dual academic intention: it not only introduces new textual cases to the classic

theory of spatial narrative but also attempts to provide detailed case analyses to nourish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boundaries of that theory itself.

Keywords

Spatial Narratives, Attic, *Jane Eyre*, *Little Women*, Comparis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阁楼”作为西方文学中一个经典的空间意象,常被用于推动情节发展与暗示人物命运。在《简·爱》与《小妇人》这两部19世纪女性意识书写代表作中,“阁楼”均承担了重要的叙事功能,不仅参与情节建构与人物塑造,也折射出作品的主旨内涵。然而,在既有研究中,《简·爱》与《小妇人》多被置于成长小说及道德叙事等框架下进行解读,而对空间叙事尤其是“阁楼”这一具体空间意象的系统比较仍相对匮乏。国外学界较早关注《简·爱》中桑菲尔德庄园阁楼的象征意义,多将其视为“疯女人”伯莎的禁闭空间,揭示阁楼作为偏僻的空间在建构女性主体性中的复杂作用。相较之下,《小妇人》的研究则更多集中于家庭空间、女性成长与道德教育,对“阁楼”这一具体空间意象的关注较少,相关讨论多零散地涉及其作为私人创作与想象空间的意义。国内学界近年来虽逐步引入空间叙事理论,对文学空间的功能与结构展开探讨,但针对两部作品中“阁楼”意象的对比研究仍较为有限,多停留在单一文本分析或象征意义解读层面,缺乏从形式空间与心理空间双重维度进行系统梳理的尝试。尽管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中曾指出,“存在空间”([1], pp. 563-564)对小说叙事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其提出的故事空间、形式空间与心理空间三维度,仍为分析虚构叙事中的空间表现提供了有效路径。

基于此,本文以龙迪勇的空间叙事理论为框架,聚焦《简·爱》与《小妇人》中的“阁楼”意象,从故事空间、形式空间与心理空间三个层面展开比较分析。通过辨析二者在空间内涵上的异同,本文试图揭示“阁楼”在文本结构、意义生成与主题表达中的多重功能,从而为解读这两部作品的叙事架构与思想内涵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也为文学空间叙事理论积累具实践意义的个案。

2. 故事空间：“阁楼”意象与女性生存状态的叙事表征

“阁楼”是《简·爱》与《小妇人》中共同存在的重要故事空间。然而,在《简·爱》中,它主要作为保守秘密、推动关键情节的戏剧性场所;而在《小妇人》里,它则更多地表现为一个承载女孩们成长、梦想与日常生活的温情空间。这种功能上的差异,直接映射了两部作品中女性角色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与命运轨迹。

2.1. 《简·爱》中的阁楼：约束的牢笼与反抗精神的孕育之地

《简·爱》中阁楼的是罗切斯特先生的妻子,疯女人伯莎居住的地方。作者夏洛蒂·勃朗特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式,将阁楼塑造成了一个阴暗和封闭的空间。阁楼坐落在桑菲尔德府的三楼,需要穿过连廊和两道门的封锁才能够到达;它的门“又黑又矮”,“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燃着一堆火,外面围着一个又高又坚固的火炉围栏,从天花板上垂下的铁链子上悬挂着一盏灯。”([2], p. 293)由此可见,阁楼的光线并不充足且装饰简陋,代表光明的东西似乎都与它无关:阁楼内没有窗户,灯是从铁

链子上悬挂下来的, 本应温暖明亮的火炉也被高且坚固的围栏禁锢着。此外, 勃朗特利用侧面描写为阁楼这一空间更加增添了神秘和恐怖的气息: 简·爱时常听见阁楼中传来的古怪的笑声和叫声, 罗切斯特房间的火烧、梅森先生的遇刺、被撕成两半的面纱似乎都与阁楼和阁楼中的人物密切相关。由此可见, 勃朗特构建的《简·爱》中的阁楼充斥着阴暗与幽闭, 与正常居住的房间相比, 更像是鲜有人至的关押野兽的牢笼。

“阁楼”在《简·爱》中阴暗封闭的形象的构建折射出了当时传统性别秩序社会下女性话语地位相对有限的生存状态。一方面, 桑菲尔德府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庄园, 有“三层楼宇”“相当规模”([2], p. 98), 而罗切斯特先生作为庄园的主人在桑菲尔德府享有绝对的话语权, 是桑菲尔德府的权力的中心。然而, 作为罗切斯特先生的妻子伯莎, 却只能居住在桑菲尔德府的边缘——位于三楼的需要穿过长廊和两扇窄门才能到达的偏僻的阁楼之中。可见伯莎虽然作为罗切斯特先生的妻子, 不但没有受到妻子应有的庄园主人的待遇, 反而被自己的丈夫罗切斯特先生极力地排挤、隐藏在庄园的角落里。阁楼在桑菲尔德府中的所处的位置恰恰反映了伯莎在罗切斯特先生眼中的地位: 女性即使作为男性的妻子仍然话语地位相对有限。另一方面, 住所作为供人休憩的地方, 理应是温暖而又舒适的。然而, 伯莎居住的阁楼暗无天日, 屋内的陈设是由“铁链子”“高大且坚固的火炉围栏”([2], p. 293)构成的, 充斥着冰冷和阴森, 像是驯兽的牢笼。“在西方主流社会契约理论中, 人权是一种‘自然权利’, 以天赋的‘自由’‘平等’等道德权利为主要内涵”([3], p. 85)。但是作为阁楼的居住者, 罗切斯特先生的妻子伯莎, 没有开启阁楼大门的权利, 通往阁楼的万能钥匙在罗切斯特先生手中, 且伯莎的一举一动均在仆人普尔太太的监管之下。由此可见, 在桑菲尔德府的伯莎并没有享受到自由行动的权利, 反而像奴隶一样地位卑贱, 受限他人的监管和控制, 被剥夺了生而为人的基本的人权和尊严。

然而“阁楼”在《简·爱》中不仅作为压抑与限制的象征存在, 同时也在叙事层面潜在地激发了主体的反抗意识。正如吉尔伯特与格巴所指出的, “阁楼中的疯女人”不仅是被压抑的他者形象, 同时也是女性主体内在对传统路径的突破冲动的物化。在《简·爱》中, 伯莎被囚禁于阴暗封闭的阁楼之中, 其生存状态体现了传统性别秩序对女性的规训。然而, 这一被严格隔离的空间并未完全消解其主体性, 反而通过一系列“越界”行为不断冲击既有秩序: 无论是深夜的怪笑、纵火事件, 还是撕裂婚纱的举动, 伯莎都在以一种极端而隐秘的方式对约束其存在的权力结构进行反抗。更为重要的是, 这种反抗并非仅局限于伯莎个人, 而是通过叙事结构与心理空间的建构, 对简·爱的主体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心理空间维度来看, 阁楼虽在物理上远离简的日常生活空间, 却始终以声音、事件等形式“渗透”进她的经验世界, 使其无法忽视这一被遮蔽的存在。当简最终发现伯莎的真相时, 阁楼不再只是一个封闭的他者空间, 而成为揭示罗切斯特权力本质的重要场所, 也促使简重新审视婚姻、道德与自我价值之间的关系。因此, 可以认为, 阁楼这一“压抑之所”在叙事过程中具有双重功能: 一方面, 它象征着女性被限制、被他者化的生存困境; 另一方面, 它又通过伯莎的“失序”行为与空间的隐秘存在, 动摇了传统性别分工的稳定性, 并间接促成了简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反抗。由此可见, 《简·爱》中的阁楼并非单一的约束性空间, 而是一个兼具压抑与反抗张力的复杂叙事场域。它既是传统性别秩序权力运作的象征空间, 又在叙事进程中成为孕育反抗意识的潜在源头。

2.2. 《小妇人》中的阁楼: 自由的乐土与疏离社会规范意志的诞生之地

《小妇人》中的阁楼共出现在两处, 一是在乔的家中, 二是在柯克太太家。两处阁楼虽有所不同, 但都是主人公乔践行自身写作理想的创作空间。乔家中的阁楼内仅有一个天窗、一张旧沙发、几个箱子还有一只小老鼠, 除此之外便是墨水瓶和写作的稿纸, 但是阁楼内十月的阳光是“和煦”的, 小老鼠是乔的“爱鼠”, 乔是在楼内连续两三个小时“奋笔疾书”的([4], p. 132)。乔在纽约柯克太太家中的阁

楼是小巧并且可爱的, 屋内有炉子、书桌以及向阳的窗户, 从阁楼上可以看到窗外塔楼的美丽景色。由此可见, 作者奥尔科特在构建《小妇人》中乔的阁楼时, 虽然如实地呈现出了阁楼的简陋和狭小, 但是无论是乔家中还是柯克太太家中的阁楼, 阁楼的整体环境都是明亮和温馨的, 乔在阁楼上的状态都是喜悦和自由的。

“阁楼”这一意象在《小妇人》中的构建象征着女性对自身理想的追寻和既定命运的反抗。乔作为马奇先生家的女儿之一, 本可以像当时其他女性一样通过婚姻和丈夫的扶持过上优渥的生活。然而乔自小的志向却是“创一番伟大的事业”, “最大的苦恼是不能尽兴读书, 不能跑步骑马” ([4], p. 35), 性格颇有绅士的风范, 而阁楼上的写作便是她敢于突破传统路径的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书中第十三章马奇先生家四姐妹和劳里交换未来梦想时, 乔对梅格希望拥有好丈夫和钱财的愿望嗤之以鼻, 反而坚决捍卫自己在阁楼上看似单调无趣的写作事业。而乔家中阁楼上的环境更加衬托出了乔希望在写作领域闯出一番事业的决心: 把箱子当成书桌, 把旧沙发当作椅子, 即使有老鼠从梁上经过也不会对她造成丝毫困扰。乔家中的阁楼的破旧和简陋与乔在阁楼上幸福的感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没有良好的创作条件, 乔依然能够坚持创作、追寻自身的梦想。乔与众不同的写作之梦悄然在家中这一方小小的阁楼中生根发芽。

柯克太太家的阁楼坐落在离乔的家乡遥远的纽约市, 见证着乔的写作事业的起伏以及对正确的写作态度的坚守和执着。乔在追求写作梦想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 当时社会的写作领域以男性作家为主导, 女性作家话语地位相对有限, 乔作为女性在争取作品发表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挠。在乔首次拜访《火山周报》编辑部时, 达什伍德先生用轻蔑和挑剔的目光看待乔以及乔的作品, 并与其他两位男士一同嘲笑乔的举止; 而在当时名流的聚会上, 所谓的主流艺术家却举止粗鄙, 使乔一再失望。另一方面, 娱乐至上的社会风气轻视作品中的道德教训, 乔为了争取作品的发表不得不迎合编辑和社会大流的口味, 追求惊悚和奇异的情节。然而这些困难都被乔在阁楼中写作的乐趣以及巴伦先生的帮助所抹平了, 乔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儿童故事作为写作题材, 不再一味为了发表而撰写耸人听闻的小说, 明白了写作真谛的同时也取得了内心的安宁。

然而, 尽管乔的阁楼在整体上呈现为明亮、温馨且富有创造性的空间, 是其践行写作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场域, 但这一空间在赋予她自由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标示出她与主流社会规范之间的潜在疏离。从形式空间来看, 无论是乔家中隐于屋顶之上的简陋阁楼, 还是纽约柯克太太家中相对舒适却依然狭小的阁楼, 它们均位于日常生活空间的偏僻的位置, 具有一定的“上升性”与“隔离性”, 象征着乔在家庭与社会结构中的非主流位置。这种空间位置一方面为她提供了远离家庭规范与社会期待的独立环境, 使其能够专注于写作, 展开想象与创造; 另一方面, 也暗示了她的志向与当时女性所被期待承担的角色之间存在张力。乔在纽约阁楼中的写作经历尤为凸显这一特点: 她一度迎合市场需求创作猎奇故事, 体现出对社会规范的妥协; 而在巴伦先生的引导下转向儿童文学创作, 则标志着她在个人理想与社会期待之间寻求平衡。这一转变说明, 阁楼空间并非单纯的“逃离现实”, 而是一个不断调适主体与社会关系的中介场域。由此可见, 《小妇人》中的阁楼既承载了女性追求独立与创造的理想, 也隐含着其与既定社会秩序之间的距离与张力, 使这一空间在自由与疏离的双重意义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叙事功能。

3. 形式空间与叙事建构: 论“阁楼”在文本中的结构功能

龙迪勇认为, 由于作家的天赋以及创作时具体情况的不同, 现代小说中存在多种多样的空间形式, 而这种叙事作品中呈现出的结构性安排便称为形式空间。《简·爱》和《小妇人》虽同为十九世纪的女性意识思想小说的代表作, 但两者各有自身独特的形式空间, 而“阁楼”这一意象在两部作品形式空间的

搭建中起到的作用也并不相同。

3.1. 阁楼在链条式空间结构中的作用

链条式结构的小说的叙事空间由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时间零”组成,突破了传统小说侧重于描绘故事发生的前因后果,即故事某一个绝对时间之前发生的事和该时间之后发生的事,但往往忽略了在该时间,即“时间零”,中发生的事情的叙事结构([1], pp. 159-160)。《简·爱》在叙事过程中,包含了多个“时间零”的存在,“阁楼”这一空间在其中起到了承载“时间零”的场景的作用。

勃朗特在创作《简·爱》一书的故事时围绕多个关键的时间段展开,概括起来可以有以下五处:寄养在舅母家被虐待、在洛伍德学校的挣扎、桑菲尔德府的生活、沼泽山庄的相遇以及重回罗切斯特身边。如果将书中的每一个时间段的经历看作故事的“前因后果”,那么每相邻的两个时间段之间的转折事件所处的绝对时间片段便可以视作“时间零”,整本书便由多个“时间零”似链条一般串联而成。

在上述五个主要叙事阶段之间,《简·爱》实际上由若干关键性的“时间零”节点加以衔接,这些节点既是情节转折的临界点,也是人物命运发生跃迁的决定性时刻。首先,从舅母家到洛伍德学校的转折,其“时间零”体现为简在红房子事件后反抗舅母权威,并最终被送往洛伍德学校。这一节点标志着她从家庭约束走向制度化规训空间,同时也开启了其独立人格意识的初步觉醒。其次,从洛伍德学校到桑菲尔德府的过渡,则以海伦之死与谭波儿小姐离开为关键“时间零”,简在情感寄托消失后主动寻求新的生活路径,通过登广告谋职,进入桑菲尔德府,叙事由“受教”阶段转向“社会实践”阶段。再次,从桑菲尔德府到沼泽山庄的转折,是全书最为剧烈的“时间零”,即婚礼被中断、阁楼秘密被揭示的瞬间。正是在这一节点上,简的情感理想与现实伦理发生根本冲突,她由即将步入婚姻的状态骤然转向自我放逐,完成从“依附爱情”到“坚守自我”的关键跃迁。随后,从沼泽山庄到重返罗切斯特身边的“时间零”,则体现为简在继承遗产、获得经济独立,并拒绝圣约翰的婚姻提议之后,听到罗切斯特呼唤的“神秘声音”,从而做出回归的决定。这一节点标志着简在精神与物质双重独立基础上,重新选择爱情。最后,回归桑菲尔德的结局节点,则体现为简与失去庄园、身体残缺的罗切斯特重逢并结合,这一“时间零”完成了人物关系的重构,使两人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亲密关系。

由此可见,这五个“时间零”不仅在结构上串联起《简·爱》的叙事链条,也在意义层面标示出主人公从受约束到自觉反抗、再到实现自我整合的成长轨迹,使整部小说在关键节点的连续推进中呈现出清晰而富有张力的发展逻辑。

在全书诸多“时间零”中,对简·爱的人生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当属婚礼中断这一节点,而这一“时间零”发生的场所正是桑菲尔德府中的阁楼。简·爱在逃离了舅母家和洛伍德学校的苦难后,来到桑菲尔德府并与罗切斯特先生相爱约定成婚,本可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在罗切斯特和简·爱的婚礼上,在阁楼上的“疯女人”罗切斯特夫人伯莎,却成了两人结为夫妻的最大阻碍。在梅森揭露罗切斯特重婚的事实后,罗切斯特被迫离开教堂,来到家中的阁楼上向众人以及简·爱展示自己已经疯了妻子。于是,桑菲尔德府三楼的阴暗而狭小的阁楼便成为了全书矛盾冲突的聚焦点。在这一“时间零”上,作者运用大量笔墨描绘了阁楼的环境、伯莎的形象和举动以及罗切斯特的话语。首先,阁楼的环境阴暗狭小,仿佛是监禁囚犯的牢笼,交代了罗切斯特真实妻子被关押的地方,也侧面衬托出罗切斯特先生冷酷无情的一面。其次,罗切斯特先生的妻子伯莎从阴暗的角落里缓缓现身:从四肢着地又跑又叫的剪影,到凶狠的神情和发紫的脸庞的神态描写,再到伯莎扑向罗切斯特对其进行撕咬的动作描写。对伯莎的描写,一方面突出了其发狂的精神状态,解释了前文梅森的受伤、面纱被撕的缘由,另一方面也不禁让人想到阁楼上的禁闭对人的精神状态的折磨程度之深。再次,罗切斯特先生的话语看似言辞恳切,实则句句在诉说自己拥有这样一个疯癫妻子的无奈,却略过了当初为了钱财结婚和虐待妻子的事实。阁楼的环

境、阁楼上伯莎的形象和举动以及罗切斯特的话语, 解释了前文中桑菲尔德府出现的古怪现象, 也促使简·爱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 为下文逃离桑菲尔德府做铺垫。

在链条式的空间结构中, 一方面, 阁楼作为“时间零”发生的场景, 承载和揭示了众多隐藏的信息, 使整个故事的走向发生了质的转变; 在狭小场景中汇聚大量的矛盾和冲突, 也使得故事更加有张力和爆发力。另一方面, 阁楼作为“时间零”的存在放大了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作为女性在传统性别秩序社会下受到的约束以及阁楼上的所见所闻对简·爱人生命走向的影响, 同时也放大了作者对社会结构中性别不平等的批判, 展现出其对女性独立自由的号召和渴望。

3.2. 阁楼在橘瓣式空间结构中的作用

与《简·爱》不同, 《小妇人》在叙事空间的构造中呈现出橘瓣式的结构。橘瓣式的叙事结构中一般有多个情节、场景或者时间线并列或者并置存在, 并通过相同的主题、人物或者情感关联起来, 共同趋向于一个中心([1], pp. 162-163)。在这种结构中, 每一个单独的情节或者时间线都像橘瓣一样是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同搭建出了叙事作品。

《小妇人》一书围绕马奇太太的四个女儿的成长经历展开, 四姐妹的故事虽然有相互重叠和交集的部分, 但总体上各自独立且带有鲜明的各自特色; 不同角色的故事由共同的家庭背景相连接, 并指向同一个主题: 女性的成长与独立。书中对四个女儿的各自人生经历的独立描写构成了《小妇人》叙事空间中互相紧密联结而不可分割的“四个橘瓣”, 共同服务于女性经验书写的中心思想。而“真爱”“写作”“音乐”“美术”四个关键词可以分别对应书中的主人公——梅格、乔、贝思、艾米——在各自“橘瓣”上主要的理想和追求。“阁楼”是四姐妹的故事的交集地之一, 同时也是作为主人公之一, 乔, 写作梦想的萌发和践行之地, 是橘瓣式空间结构搭建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阁楼作为马奇太太家的一部分, 是在幼时将四姐妹联结在一起, 共同度过幸福时光的场所, 是四姐妹各自“橘瓣”的故事相交汇的空间之一。虽然《小妇人》一书中很多地方并没有直接点出四姐妹在阁楼上玩闹情境, 但是从书中的一些细节中可以瞥见阁楼是四姐妹共同留下重要回忆的场所。在书本的第四十七章巴尔先生和乔交谈的过程中提到了乔曾经创作的诗歌《阁楼里》。诗的开头这样写道:

“四只小箱排成行,
.....
出自而今正值青春年华的孩子。
.....
盖子下面藏着,
这帮幸福人儿的历史。
曾经玩耍在这里, 经常停住,
去倾听甜蜜的节奏,
它来自高高的屋顶
淅沥而落的夏雨。” ([4], p. 426)

诗歌以“阁楼里”为名, 直接点出了“阁楼”这一地点而非家中其他地点, 可见阁楼是给乔留下深刻回忆的地方。乔在诗的开头便点出有阁楼中有四只小箱子分别属于四个姐妹, 藏着“幸福人儿的历史”“曾经玩耍在这里”, 经常倾听夏雨“甜蜜的节奏”。由此可见, 阁楼是书中的四姐妹共同享有美好回忆的地方, 是将书中四位主人公各自的故事(“橘瓣”)关联在一起的重要场所之一。“阁楼”在此处起到了联结橘瓣式空间结构中并置的多个情节的作用。

同时, 对于乔个人而言, 在乔的成长初期, 阁楼是孕育乔追寻独立和写作梦想的温床。阁楼在乔幼

年时为她提供了阅读的場所, 也为乔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不断的成长和摸索中, 乔发现了自身对于写作的热爱, 并将写作视为维持生计的方式, 家中的阁楼便成了乔的创作場所。在孤身前往纽约做家庭教师后, 柯克太太家的阁楼又成为乔继续追寻自身写作事业的地方。阁楼一方面贯穿了乔的成长历程, 见证了乔在写作事业上的成长和前进, 另一方面为乔提供了安心创作的空间, 是构建乔追寻梦想、塑造个人品格和实现独立的“橘瓣”上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因此, 在形式空间上, 阁楼在《简·爱》和《小妇人》两部作品的组织架构中起到的作用并不相同, 服务于不同的作品情节走向。《简·爱》一书由类似于链条式的空间结构构成, 每一段“链条”都代表着主人公简·爱在不同人生阶段中的境遇和成长。阁楼在这一作品中作为链条式结构中“时间零”的存在, 起到了突出情节和制造转折的作用: 一方面使得作品在组织架构上着重描写了伯莎在阁楼上的悲惨遭遇以及简·爱在阁楼的所见所闻——放大了“阁楼”作为约束女性的場所而存在的残酷和无情以及女性在传统性别秩序社会下的低下地位, 另一方面促使简·爱的人生命运发生了转折——揭示了罗切斯特先生已经存在一位妻子的事实, 打破了简·爱想要于罗切斯特成婚的幻想, 促使她重新思考自身命运, 放弃对罗切斯特先生的依恋, 离开桑菲尔德府并前往沼泽山庄, 走向一条更为艰苦但更为独立的道路。而《小妇人》一书中的阁楼拥有着与《简·爱》不同的两个作用, 一为橘瓣式空间结构的衔接点, 马奇太太家中的阁楼是其四个女儿的人生经历的交集处, 使得整个故事得以马奇太太家四位姐妹的人生经历展开, 共同指向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主旨思想; 二为主人公乔的“橘瓣”上具体故事的发生空间, 是串联起乔幼时和长大后实现个人梦想和价值的重要場所, 马奇太太家中的阁楼是乔小时候孕育写作梦想的温床而纽约柯克太太家中的阁楼则是乔成长后在写作事业上拼搏的见证者。相比于《简·爱》中阁楼作为“时间零”对作品情节起到的放大和故事走向的转折效果而言, 《小妇人》中的阁楼更服务于将主人公分散的故事情节连成整体, 串联起四位主人公的各自经历, 以及衔接起乔在小时候以及长大后的经历。

4. 心理空间的内在图景: 论阁楼作为社会与个人经验的交互投射

龙迪勇的《空间叙事理论》将“心理空间”的内涵与作者的心理活动相联系, 将其定义为: “作家在创作一部叙事作品时, 其心理活动(如记忆、想象等)所呈现出来的某种空间特性” ([1], p. 563)。“阁楼”作为《简·爱》和《小妇人》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其呈现出的心理空间特征均是当时社会环境与作者个人经历的环境相结合的产物, 然而两者体现的情感倾向却并不相同。

4.1. 阁楼作为压抑现实的反映

《简·爱》中的阁楼是囚禁疯女人伯莎的地方, 象征着封闭和压抑。阁楼作为这一独特形象在作品中的呈现与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以及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所见所闻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 家庭女教师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 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特里·伊格尔顿曾在《勃朗特姐妹: 权力的神话》一书中指出家庭教师的身份让当时受过教育的女性陷入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窘境: “一边是想象中的远大抱负, 另一边是把她们仅仅当作‘高级’仆佣的冰冷社会现实” ([5], p. 14)。

为了维持生计, 1839 年勃朗特曾在斯通加普的约翰·西德威克夫人的宅院中担任家庭教师一职, 而《简·爱》一书里桑菲尔德府中“阁楼”形象的塑造, 就与她在担任家庭教师期间实际的压抑的感受以及所见所闻密切相连。在勃朗特做家庭教师的过程中, 她充分体会到了上流社会对待家庭教师的冷漠与忽视。在 1839 年 6 月勃朗特给妹妹的信中, 她写道: “我算是看清了, 如果不是需要她完成的那些令人厌倦的杂务的话, 私人女教师是没有存在感的, 根本不被当作活生生的、有理性的人看待” ([6], pp. 187-188)。正是这种家庭女教师在工作中的被忽视和像奴隶般的不平等待遇, 促使勃朗特将屈辱和压抑的情

感与上流社会家族的宅院空间相联系, 将简·爱担任家庭教师的桑菲尔德府作为情感的承载空间。

而在《简·爱》中, 阁楼作为桑菲尔德府中矛盾冲突的焦点和封闭压抑的集中体现, 也有其现实中的映照。艾伦·努西指出勃朗特在斯通加普的贵族家庭担任家庭教师期间, 曾参观过一座名为诺顿·科尼尔斯的古老宅院, 而据传这所宅院的阁楼上曾经是一位疯女人住所。患病的女性并不能享受到救助和同情反而被束缚在阁楼之中, 可见在当时英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不高, 而这一现象的出现与维多利亚时期的婚姻制度、法律保障以及道德观念密切相关。首先, 从当时的婚姻制度来看, 维多利亚时期的男女结婚后, 夫妻便会形成一个法律实体, 而丈夫则是这个法律实体的代表人。这就意味着当时女性在婚姻之中的财产、收入和金钱均由其丈夫所控制, 而女性本身则成为依附于丈夫的存在, 并没有自己经济等方面的独立的权利([7], p. 139)。其次, 就法律保障而言, 维多利亚时期虽然对女性的法律保护有所提高, 但是在婚姻之中女性仍处于法律上两性关系的弱势一方。怀斯(Wise)指出英国国会虽然在 1853 年通过了有关防止和惩罚对女性和儿童家庭暴力的法令, 但这一立法并没有完全消灭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现象, 其实际运用和实施也处处受到限制([8], p. 112); 1890 年婚姻诉讼法令(Matrimonial Causes Act)的出台虽然赋予了女性离婚的权利, 但是由女性提出离婚所需要提供的证明仍然比男性的更为复杂, 法律对传统性别秩序的偏袒使得女性的地位长时间处于低下状态。再次, 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观念也为女性戴上了枷锁: 当时社会普遍认为男性拥有多个性伴侣是可以被接受的, “男性不用对自身的性行为负责”([9], p. 134), 而女性只能对其丈夫忠诚, 单身母亲则将会被认为是“社会的害虫”([9], p. 132), 社会道德的谴责迫使女性只能依附和囚禁于传统性别秩序的掌控之下, 而无法真正获取自身的独立和自由。最后, 英国作为在“光荣革命”的斗争与退让中产生的君主立宪体制国家, 主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斗争与妥协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社会的主旋律([10], p. 58)。而《简·爱》中性别分工体系的斗争本质上可以折射出社会上层身份和底层群众的斗争, 两者的关系在持续的抗争和相互制衡中不断演变, 最终得以维持平衡。可以窥见, 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在社会地位上的失权离不开经济、法律、道德、历史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阁楼作为囚禁女子的存在的现象也因此得到了解释。

因此,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家庭教师和女性的悲惨遭遇以及勃朗特在贵族家庭中担任家庭教师所受的屈辱和折磨为《简·爱》中的阁楼空间的构建提供了情感的来源, 而现实中诺顿·科尼尔斯中的阁楼空间的存在为书中阁楼的构建提供了实际的空间参考, 勃朗特自身所经历的压抑和封闭的现实是《简·爱》一书中阁楼这一空间构建的动力和源泉。

4.2. 阁楼作为自由美好的反映

在《小妇人》一书中, 阁楼空间作为乔的写作和成长的见证者和陪伴者, 象征着自由与美好, 是乔一生中经历的重要空间场所。虽然在作者的生活中并没有相对应的现实空间与之形成对照, 但阁楼在《小妇人》一书中的形象仍是当时美国社会现实和奥尔科特的写作经历共同形成的抽象产物。

《小妇人》创作于 19 世纪中期美国南北战争期间, 描绘了马奇太太家四位女儿的成长故事。在这一时期, 爱默生以“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为核心的超验主义思想在美国文学界盛行。受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 人们开始强调作为人本身的尊严和神圣, 敢于挑战和蔑视原有的传统和权威, 女性的独立意识也因此萌发。《小妇人》中的乔便是奥尔科特受美国社会盛行的超验主义和女性独立思想影响所创造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乔认为女性应该依靠自己过上幸福生活, 并将写作视为使自己独立和谋生的手段, 追求自身写作事业的不断精进。阁楼作为乔的写作事业发展的见证者, 也伴随着乔争取女性自我独立的斗争。因此, 作为乔写作以及追寻自身理想和独立的空间, 阁楼总是充满着阳光、美丽的风景以及伴随着主人公写作的愉悦之情。

就奥尔科特自身的经历而言, 在其哲学家与作家父亲的耳濡目染下, 奥尔科特自小就对写作产生了

兴趣,并在撰写《小妇人》一书前就曾成功发表过诗歌和小品,奥尔科特自身写作兴趣的生长有着良好的空间的支持,培养环境呈现出积极向上的色彩。作者对自身创作的环境的认可使其对阁楼这一写作的空间赋予了美好和自由的色彩:乔在家中的阁楼创作时感受到“和煦的阳光从天窗上照进来”;在纽约的阁楼中写作时也是感到“立刻就喜欢上了我的书房,觉得爬再多的楼梯也心甘情愿”。作者个人的感受与乔在《小妇人》中表现出对阁楼的喜爱遥相呼应,奥尔科特自身经历的写作空间也成为了创作阁楼这一空间时幸福美好的情感的来源。

吉尔伯特与格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指出,19世纪文学中反复出现的“阁楼中的疯女人”形象,实则是女性在传统性别秩序话语压抑下被分裂出的“他者自我”,象征着被限制的欲望、愤怒与反抗意识。这一理论框架为理解《简·爱》中伯莎·梅森的存在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所处的阁楼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封闭空间,更是男性权力对女性身体与精神实施规训的隐喻性场域。从心理空间层面而言,伯莎既作为简·爱的对立面存在,又可被视为其潜在对传统路径的突破意识的外化,体现出女性主体内部的分裂性与张力。然而,在《小妇人》中,其解释路径则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与局限。《小妇人》中的“阁楼”更多被建构为一个开放且富于创造性的空间,是乔进行写作、表演与想象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心理空间层面,阁楼亦不再承载被压抑的“疯女人”形象,而转化为女性主体自我表达与精神建构的象征性空间。因此,与《简·爱》中作为压抑与他者化象征的阁楼相比,《小妇人》中的阁楼体现出一种去压抑化、内在化的空间意义。

5. 结语

综上所述,《简·爱》与《小妇人》中的“阁楼”意象,虽同作为与女性命运紧密相连的故事空间,却因时代背景、社会语境及作者经验的差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叙事功能与象征内涵,并且各有其复杂性。一方面,《简·爱》中的阁楼作为囚禁伯莎的封闭空间,集中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传统性别秩序结构对女性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约束;但另一方面,这一极端压抑的空间又通过伯莎的越界行为与叙事中的不断“渗透”,成为动摇既有秩序、激发简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潜在力量。同样地,《小妇人》中的阁楼虽呈现为温馨明亮、承载梦想的创作空间,象征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发与成长,但其空间位置与相对封闭的环境,也隐含着乔与主流社会规范之间的距离与张力,折射出女性在追求独立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制约。因此,“阁楼”在两部作品中均体现出一种内在的张力结构:既是压抑与限制的场所,又是反抗与生成的起点;既可能指向话语地位相对有限的生存困境,也可能孕育主体意识的觉醒与重构。正是在这种相互矛盾却又彼此交织的多重意义中,“阁楼”超越了单一的象征功能,成为连接空间形式、人物心理与意识形态的重要叙事节点,共同深刻揭示了女性不同的生存境遇并强化了各自作品关于女性意识觉醒与追求自由的核心主题。

致 谢

本论文的写作过程得到了多方的支持与帮助,谨此致谢。

首先,感谢浙江省外文学学会专题研究项目“查尔斯·切斯特纳特作品中的法律书写”以及浙江师范大学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你们的慷慨支持为本论文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同时,感谢指导教师对选题方向、框架建构及内容修改等方面的悉心指导与耐心帮助,感谢所有在资料搜集、思路整理、语言表达等方面给予我无私帮助的老师 and 同学们。没有你们,本研究将无法顺利进行。

此外,感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所阅读和引用的相关文献及研究资料的作者、编者及出版机构,你们的研究成果为本论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启发。

最后, 感谢一直默默陪伴和鼓励着我的家人和朋友们, 你们的支持使我能够全身心投入论文写作。在此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浙江省外文学会 2023 年专题研究一般项目“查尔斯·切斯纳特作品中的法律书写”(ZWYB2023040)的研究成果; 浙江师范大学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支持项目(项目编号: X202410345012)。

参考文献

- [1] 龙迪勇. 空间叙事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 [2] 勃朗特·夏洛蒂. 简·爱[M]. 黄源深,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
- [3] 冯永欣, 程美东. 马克思主义人权与公民权对西方传统契约理论的超越[J]. 马克思主义哲学, 2024(3): 85-93, 168.
- [4]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小妇人[M]. 王之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 [5] 特里·伊格尔顿. 勃朗特姐妹: 权力的神话[M]. 高晓玲,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 [6] Gaskell, E. (1973)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Penguin Books.
- [7] Lorimer, D., *et al.* (2005) *Rediscovering the British World*. Calgary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515/9781552384381>
- [8] Wise, S. (2009) *The Blackest Streets: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Victorian Slum*. Vintage Books.
- [9] Cody, F.L. (2000) The Politics of Illegitimacy in an Age of Reform: Women, Reproduc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England's New Poor Law of 1834.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1**, 131-156. <https://doi.org/10.1353/jowh.2000.0005>
- [10] 马小朝. 小说《简爱》中包藏的历史隐喻[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29(2): 53-58, 100.